天津文史資料選輯

第五十一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天津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天津人民出版社
一九九〇年七月

China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主　　编

游德昌　方兆麟

执行编辑

杜文彬

天津文史资料选辑

第五十一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天津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

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天津市赤峰道150号）

天津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

*

660×1168毫米　32开本　6.25印张　132千字

1990年7月第1版　1990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000

ISBN7-201-00507-3/K·77

定　价，2.50元

China

目　录

我的一生……王华棠（1）

陈调甫传略……徐增祥（19）

解放初期的朱继圣与仁立实业公司

……石火　张竹涛（37）

天津玉盛永地毯厂创办人李玉德

事略……李玉璞（53）

天津冶金工业史略……张　鹏（55）

天钢四十年……张　琬（76）

我任阎锡山驻津代表时与日人三野

来往的经过……南桂馨（96）

在阎锡山电讯机构工作的几点回忆……阎子奉（109）

阎锡山出任“行政院长”的见闻……贾文波（123）

天津的戏园……郑立水（138）

漫谈戏曲后台工作及其他……马司驹（158）

漫话旧戏班与“经励科”……潘侠风（191）

·以史鉴今·

护士——神圣而崇高的职业……项伯龄（194）

·小资料·

天津盛锡福帽厂史料补正……梁吉生（75）

解放前天津小刘庄一带的戏园……师　墀（108）

China

我的一生

王华棠

(一)

我生于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老家是直隶赵县城里石塔村。因清末正废科举立学堂，我父亲庆宇公思想开朗，就在家中腾出一间空房办学，但仍教旧书，我得以随父亲通读了“四书”（《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关于“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和“言忠信行笃敬”一些话在我心中永生不忘。以后，这所家庭小学扩充为赵州直隶州的第一所小学。14岁时高小毕业，1916年考入了天津南开中学。转年暑假直隶省闹大水，我又患伤寒病，不能来津上学，便就近转入直隶州的赵县中学插班。1920年暑假毕业后，我到北京考大学，时值北洋军阀直、皖两系开战，北京各大学都暂停招生，只有唐山交通大学可以报考，我即考入交大，在这里念了六年书。交大的老师、校风都很好，学生们俭朴成风，读书也很勤奋。

在交大读书六年间，发生过两次直、奉军阀大战。战事一起，处在北宁铁路线上的唐山交大即成为兵站，或驻军队，或成为伤兵医院。至是学校停课放假，我就去北京和一位同学住在一起，乘机到北京大学旁听。北大校长是蔡元培先生，他的教育主张兼容并收，新旧学派教师都有，所以我听了不少名家

China

的讲课。新派有胡适、陈独秀；旧派有留着大辫子教英文的辜鸿铭。另外还有鲁迅、林语堂、周作人、徐志摩等教师的课。北大还有个造型美术研究班，胡佩衡、刘子泉、齐白石等是导师，我的写字和绘画，都是那时候学的。1926年我于交大毕业，遵照父亲遗愿“到外国留学，开开眼界”。于是我又到美国读书。

唐山交通大学和美国康奈尔大学关系很深，交大毕业生到康奈尔大学不用再考试，在交大多用英语上课，去美留学没有语言的困难。和我同时去美国的同学有不少人，我选的是铁路工程信号专业，1927年获得土木工程硕士学位。康奈尔是一个小村镇，属纽约州的大湖岸上，风景很好，能安静读书。经过一年刻苦学习，获得学位并加入P. K. P.荣誉学会为会员。我对这里读书环境很满意，但对美国社会的某些方面，给我的印象并不好。上学时，在校外租房居住，房主是位犹太籍的老太太，管理着自己的房子，有六七间出租，分租给大学生，每人一间，她的工作很辛苦。象她这样的还有一位原唐山交大的化学教师，也是康奈尔大学毕业生，母亲一人留在家中管家，也是出租房子给学生住，负责一切家务生活；另一位是著名的老教授彻切尔，退休后由自己管理、出租房子，而他们的儿女和亲属都如路人一般。对此我很看不下去，我对他们说，“在中国没有这样冷淡老人的，人情味太少了。”这一年给我的印象就是如此。

毕业以后找工作，当时有两个机会，一是到州公路局，另一个是到铁路信号公司实习。我的主科是铁路，这就决定我选择了后者。该公司距康奈尔百余里，地名是罗伦斯特，风景优美，有花城之称。因为制造名牌柯达照相机的柯达克其人生在

China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这个城市，故又称柯达克城。我在这里工作了一年多，收获很大。

在柯达克城，我住在基督教青年会的宿舍内。这里住的人很杂，欧洲人、中东人、南美人都有，有上学的也有工作的，所以我结识了不少的朋友。有一对意大利夫妇，是共产党人，在墨索里尼法西斯暴政下，他们被迫流亡国外，他们的小男孩和我很友好，每到星期日就住在我的宿舍里。另一位是叙利亚的亡命者，很关心中国的事情。1928年 6 月，张作霖在皇姑屯被炸身亡的消息，就是他听到广播后半夜打门告诉我的。还有一位红种人，和我在一个公司办公，管绘图，他总是发牢骚骂白种人掠夺了他们的土地，把他们土著人赶到一个指定的小圈子里生活，没有自由。他天天都是这样骂，表现出对美国统治者的不满。直到现在他们印地安人还是这样生活着。我回国以后，这位印地安朋友还和我通过信。

这些外国人都很想多知道一些中国的事情，我也愿意向他们介绍我国的情况。我去美国留学时，曾带去当时中国的五色国旗和孙中山先生的照片，都挂在我宿舍的墙上，他们来时，我就对他们讲孙中山先生和中华民国成立后的一些情况。此外，很关心中国情况的青年会干事查尔斯，还多次组织小型报告会或座谈会，让我给他们介绍中国，一般是周六或周日的晚间进行，有三五十人或百八十人参加，这是青年会的一项活动，也很受欢迎。

在这一年里，我还利用富裕的时间，将我由国内带去的《中山全书》通读了一遍，收获确实不小。青年会旁有一个大学图书馆，我可以随便借书看，使我充实了自己的知识。在美国，除得到少数要好者的尊重外，中国人在国外很受歧视，如

China

(二)

回国后，正值国民革命军北伐成功，心里很高兴。1929年春去上海参加铁道部召开的一次技术会议，并写了一篇关于铁路信号的论文。接着就应老同学之约到南京工务局工作，搞南京的自来水工程。南京工务局局长张剑鸣和新成立的自来水工程筹备处处长金肇祖，都是交大先期同学。我到宁后主要是帮助搞筹建自来水工厂工作，水源当然是取自长江。水厂厂址几经调查、研究、比较，确定建在清凉山，并与外商自来水公司洽谈协调事宜。

正当南京自来水建厂工程初具规模之际，东北易帜，政治面貌一新。彭济群新任辽宁建设厅厅长，彭是法国留学生，学建筑专业，和旅法名人吴稚晖、李石曾、李书田等交好。彭上任后，工作亟待开展，经李书田推荐让我到辽宁省建设厅当技正，负责技术工作。当时内战结束，全国统一，安定可期，心中感到欣慰，又以建设厅工作广泛，适合土木工程学科知识的应用，我即应邀前往。到职后，被派搞公路、水利方面的工作。在测量、勘察等工作进行中，不但费了不少心力，而且很受日本当局的气。日本关东军阴谋炸死张作霖后，其侵略势力更加猖狂，沈阳车站地区简直不像是中国所有，更无理的是日本的测量人员为所欲为，公然在建设厅门前摆上三角架，旁若无人地进行测量，谁也不敢管，嚣张气焰已达极点。我们是有不少工作该做，但由于政治上不堪设想，工作无法开展，心里很不安宁。

在沈阳干了一年，适李书田到唐山工程学院当院长，邀我到那里任总务长和教一些课程。我是交大出身，校中老师很多，工作中得到不少帮助，心情也很愉快。但干了一年后，彭济群

China

调任华北水利委员会委员长，李书田兼任该委员会总务长，又邀我到委员会所在地天津帮忙。我对水利工作很感兴趣，就同他们来到天津。

华北水利委员会的前身是顺直水利委员会，曾做过一些测量、水文等基础工作，有四个测量大队，每队有百人左右，在华北各河上、中游设有水文、气象、雨量站，工作也有些基本建树。华北水利委员会成立后，在天津建立了一个测候所，这个测候所的资料现在都保存在气象台，可算是天津气象台前身的一部分。同时，还在宁河茶淀测站附近成立了一个农业试验场，即现在茶淀农场的前身。原来我们只管治理河道，未注意它和生产的关系，后来考虑这是个缺欠，就成立了正式农场。在成立的典礼仪式上，水利专家李仪祉老先生参加了。农业试验场由留法的农业专家韩少琦负责。另外，还办了一个水工试验所，是同工业专门学校合办的，名为“中国第一水工试验所”，就设在黄纬路工业专门学校内（以后为河北省工学院），即现在的天津大学水利系的前身。

华北水利委员会由南京政府直辖，人员的遴选是由交通大学、天津北洋工学院、工商学院、河北工学院等北方各大学的尖子人材参加；业务技术方面，成立了测量和工程两个组。测量有水文、气象、地形等几方面，由我负责，工程组管设计、施工，由高镜莹负责。华北水利委员会专负责华北海河流域的治理，不管天津地方上的水利事情。因为1917年的大水淹了整个河北省，这就必须对整个海河流域进行规划治理才能解决。在我们以前，顺直水利委员会对测量下了很大功夫，测量技术也强，重点是对永定河的测量。华北水利委员会成立后，继续做这项工作，从当时的内蒙古、哈察尔，一直到永定河的

China

主要支流，都进行了勘察，最后作出了永定河的治本计划，特别提出要修好官厅水库——当时号称为中国第一大水库工程；还有永定河和北运河在屈家店汇合处的塌河淀工程。塌河淀放淤工程，原由海河整理委员会负责，以后也交给了华北水利委员会施工（海河工程局在解放以后也一度划归给华北水利委员会）。于1932年完工，轮年在淀南、淀北两个放淤区放淤，后因华北形势紧张，没有钱，故官厅水库工程计划一直是空的，是纸上谈水。不久，“七七”事变爆发，我们就南迁了。

(三)

卢沟桥的枪声揭开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序幕，我和天津的部分同仁于1937年10月初来到南京，李书田未能同来，因而华北水利委员会总务长一职，由我兼代。国事日非，前途莫卜，本会在桑乾河、东洋河一带，尚有若干外勤人员将陆续南来，所有经费及人事安排，都需及时解决。可是当时全国经济委员会由秦汾主持，只是因循敷衍。一味拖拉，使得一切难于进行。

淞沪战役历时三个月，国军最后退出，华北战场太原失守，形势危殆，政府正式宣告迁都重庆。因而我会决定先赴武汉，候船至1938年 2 月中旬始抵重庆。战时首都一片混乱，费了很多周折安排了大家吃住问题，此时政府改组，所有水利机构改隶经济部，以前所提的经费和工作问题，仍不能获得彻底解决。重庆距武汉远一点，多一点安全感。我们先住市内，虽属暂安，也算有个立足点。但几个月之后，日寇飞机连续轰炸重庆，我们又被迫迁到长江南岸的山区放牛坪。在那里租了两处房子，设立工务和总务两个处，支撑局面。

当时政府财政困难，并没有工程可做，只有在多处联系。

China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这期间我抽暇读了冀朝鼎氏在美国所写的《中国历史的经济区》一书。冀的论文结合中国的历史，认为不管哪个朝代，要想立国富民，就要靠水利，要有个经济区，才能站住脚。如春秋战国时期的各国，没有黄河的水利不行，吴、楚是靠长江，三国时的蜀汉是靠四川的水利等等。对人颇有启发。据此，我撰写《华北水利工程三十年》一稿，是为中国工程师学会成立三十年征文而写的，现在还能够在市图书馆里查到。

在重庆经与各方联系，陆续做了几项工程：

（1）听说四川盐务局自流井分局，拟请我会为之设计改善运盐水道。经往调查洽商，晤缪局长，适值张伯苓校长亦在彼处，微病初愈，经我询候，答谓："国仇未报，不敢久病"。盐井河道经视察，除数处稍有问题外，大都可通航无碍。校长为华北水利委员会委员，大力赞助让我们做，并说："天下英才聚于是矣。"这项工作就算定了。

（2）川黔间长江南岸支流綦江航道工程，我们参加勘测工作。

（3）当时广西偏安一隅，政治气氛比较清明，有整治境内柳江的意图，并经重庆政府同意，我们就在柳州设立了一个摊子，调一部分技术人员前往帮助工作。另外，还做了一个小型灌溉工程。没料到后来柳州沦陷，员工奔散，公私均受到很大损失。

1938年3月，李仪社先生在陕西病逝，享年56岁。中国工程师学会在重庆青年会礼堂隆重举行追悼会，我敬献挽联抄用成语"惟大学问功高心愈下；是真澹泊身殁志益明"。会由陆叔言主持，胡香泉司仪，胡康华主祭，我宣读学会祭文，顾毓琇、余福来（德领事）、郑肇经、彭志云、须恺均致词，高度赞扬先生的学识品德与奋天佑实为中国工程界之二杰。

China

这一段时间，我经常往返重庆、贵阳、柳州、桂林，虽然忙累，但有工程可作，并开了眼界，全体同事的情况也很好。蒋经国在赣南当专员时，听说他要在那里建树一番事业。我们估计也会有工程可作，经过一番斡旋，我会本部于1943年底迁往赣州。不料到达后，看不见有何新气象，没事可做，最后只在赣州附近作了一项保护田园的防风小工程。我们在赣州西郊下佛岭背处盖了几间办公用房，闲时进城游玩。曾多次看过阳翰笙编导的话剧《天国春秋》，剧本、演员均很好，名噪一时。再有就是1944年春节时，远远看见蒋经国身穿长袍马褂，带着他的苏联籍夫人，给当地士绅去拜年。几个月后，因南昌沦陷，情势危急，我们就离赣东去。

我们东去的目的是福建长汀，中途经过瑞金，这里曾是红军的根据地，本地老人还能指着一座庙或一座戏台，讲述些当年红军文娱活动和故事。我们住在一所中学的课堂，席地而眠，时正冬日，当晚有小风雪，这里房瓦都是摆在木椽子上，不用泥灰稳住，屋里很冷，雪花由瓦缝漏进屋里，落在人们的脸上，一夜没有睡好。

到达长汀时，雪后的长汀山区，风景很美，厦门大学已迁到这里。城里用房很紧，我们住在长汀以南数十里的河田乡。在这里共住了半年左右，只做了两项工程，一是濯田乡的灌溉，规模不大，由高治枢负责；一是疏浚整治沙溪河道，由董开章负责。河田乡有三件事情，给我很深的印象：

（1）征兵拉壮丁，三天两头可以看到几十几百人都有。壮丁们衣衫褴褛，由持枪的士兵押着，住在我们住处对面的一座庙里，差不多每次在转天壮丁们被押走后，还要拉出几具壮丁的死尸。

China

(2)在闽南、粤东一带，人们生活很苦，长汀街上不断有所谓“人市”，就是卖人的市场。从几岁到十几岁的小孩都有，插标卖首，可以讨价还价，其中女孩较多，多是卖出去当丫头。从前只听说的这种人间惨事，在这里都司空见惯了。

(3) 男女结婚年龄悬殊较大，多是女大于男。有的家庭虽然还没有男孩，也要预先娶个女子等着，就是所谓的“望郎媳”。在婆家望十年，望十五年的都有，因为这种原因，当地一些家庭关系时有不正常现象，也就能有所理解了。

我们是1945年初到达长汀，住了半年多的时间，日寇就宣布无条件投降了。

(四)

抗战胜利，人心欢腾，我们在河田乡搭了台子，和农民们联欢庆祝。欣喜之余，都盼早日复员还乡。当时交通阻隔，大家只好分头绕道北归。我先到福州，本拟乘轮船北来，轮船不开，乃转沪飞平，其余员工一直到1946年春才陆续抵达天津。很多人从大后方飞回来抓权抓钱，我们华北水利委员会的人想的很简单，认为在后方流亡八年，回来就是想工作，以补前失。我是辗转回来最早的一个，就找到原来在天津意租界的那所空房子（在现第一工人文化宫附近），在门前挂上一块牌子，这就是我们的“接收”。

华北水利委员会的留守人员中，有吴树德和金海祥两位同事，在沦陷时期被日本宪兵队惨害，他们都死得很英勇。

吴树德，字仲滋，上海人。1936年时才四十岁，是技师兼测候室主任，手很巧，能自制不少机件待用。测候室有一部废旧不用的电台归他掌管。后为日本宪兵逮捕，诬彼与后方国民党

China

有联系，倍受酷刑，吴仲滋骂贼不屈，被开水浇烫而死，遗尸海河。

金海祥是气象测候员，北京人，1936年时才二十五岁。被捕后也是骂贼不屈，于吴仲滋死后自己撞墙碰死了。海祥的妻子去宪兵队询问时，有特务回说“没有此人”，但回答者脚下穿着金海祥的皮鞋，当金妻指出，特务无言答对。胜利以后，吴树德、金海祥两人被国民党当局追认为烈士，在天津的烈士祠里有吴、金牌位。

此外，还有少部分留守旧同人曾被调到北平的伪华北建设总署。我们复员回来以后，还接着做我们的工作。

八年抗战期间，华北水利委员会的招牌挂到南京、武汉、重庆、柳州、赣州、长汀，地区不可谓不广，但在民族危亡之秋，何展建设宏图，流亡所至以残茶剩饭维持局面，协助地方搞些小型事业而已。在重庆时向政府机关筹措生存费用问题，那种艰难过程，是永不会忘记的。今暴寇投降，艰苦岁月应可结束，虽知国民党统治腐败，同时又幻想其革心换面，爱民救国。而在那些“发国难财”，又“发接收财”，争权夺利，互相倾轧的一片黑暗中，我们所抱负的“科学救国”、“工程救国”的宿愿，亦只是自欺欺人，事实上是做不到的。

1947年6月，南京水利部召开全国水利会议，会后水利机构有些变动。7月华北水利委员会改为华北水利工程总局，彭济群调任东北嫩江省政府主席，我任华北水利工程总局局长，高镜莹任副局长。

我国抗战胜利，世界大战亦告结束，联合国成立救济总署（简称“联总”），南京行政院相应成立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简称“行总”），办理救济物资、粮食、器材的分配发放等

China

事宜。对永定河治本计划认为经过长期筹划，迭经国际联盟灌溉专家前来勘探，官厅水库设计提到世界联总灌溉希腊专家前来赞助的高坝会议上进行研究。在1947年度南京行政院通过官厅工款为二百亿元(法币)。联总、行总于是年7月在北平成立了由七人组成的审议委员会，负责对联总的粮款物资，进行监督保管，每月开会一次。计有：胡适（北京大学校长）任主委；童冠贤（行总平津分署署长）；刘瑶章（北平参议会议长）；张砺生（察哈尔省建设厅长）；雷洁琼（燕京大学教授）；金甸卿（中美工程师学会负责人）；王华棠（华北水利工程总局局长）。

7月间在北平成立官厅水库工程局，由清华大学张任教授担任局长。首先建设的是怀来、官厅间一条25公里的公路。官厅水库酝酿多年，今得实现之可能，自是兴奋非常。不过另一方面，联总如此施舍性的粮款，接受并无若何光彩之可言，由于急欲求成，只好忍气吞声。1948年由于战局紧张，怀来一带已成游击地区，工程无法进行因而停止。联总物资也被国民党军政机关分取一空。

在此期间，华北水利工程方面，进行了滦河堵口工程和永定河梁各庄堵口工程。与北洋大学等学术机关合办的中国第一试验所，在大红桥畔经过常锡厚、郑兆珍等一年多的努力，已初具规模，旋即进行试验工作。延续至1956年间，主要做了独流入海减河及其进洪闸大清河白草洼；官厅水库溢洪道等模型试验；独流船闸淤积问题；盐、淡水交流问题；海河裁湾；陡河水库泄洪闸，新港回淤问题等试验。土工方面，官厅土坝、三家店工程等基础土壤施工控制试验等等。

天津解放前夕，北洋工学院院长李书田，海河工程局局长向

China

迪琮和北平市副市长张伯瑾等，都要我和他们一同走，张还说："我们都是榜上有名的，决不能呆了。"我说："我是搞技术的，财政公私分明，问心无愧，无劣迹，无仇人，决定不走。"在1948年最后一天的日记本上写了下面的一段话：

岁月如流，今为民国三十七年最后一天，回顾一年经过，无论国际国内，都充满惶惧与不安，平津为硝烟烽火所笼罩，洗劫将演至如何程度尚难逆料，处此时期，不应唱高调，只须镇静自处，求自己心之所安，清廉勤苦，我行我素，深信在任何局面下，当皆能心安理得也。

1949年新年在炮声隆隆中度过。我住在芷江路，1月14日实为毕生难忘之日，市内落弹甚多，皆自河东打来，近午枪炮声逼进黄家花园一带。家人集后院小屋内，爆炸声迄未稍停，墙屋震动，惊心动魄。转天出门观看，尸体横陈，尚未移动，临街房屋弹痕累累，盖耀华中学是战事小中心也。而我们的工作一天没有中断，一直维持到1949年1月14日解放桥中炮以后，机关附近居民有的躲进来"避难"，也确实工作不下去了。

天津解放的第二天，有人来机关接收，接收人员是本委员会的旧同事徐正工程师，他是老北洋大学毕业的，干水利多年。现任华北人民政府华北水利委员会副主任，这次随军进城，水利机构由彼接收。他说，对华北水利工程总局的情形都知道，只是办个手续就行了。他向我们交待了政策，讲了对科技人员、知识分子一定要重视的话，让我们安心工作，不要有任何顾虑。他就住在局里，对他的穿着虽有些看不惯，但我们无话不谈，相处很好。财务、事务、工程等造册交接手续，很快就完成了。当时工程处在外地，还有一个测候所，在唐山、

China

石家庄还有两个工程事务所，也都做了交接。事后得到华北人民政府的表扬。

华北水利工程总局，去掉一个“总”字，改称华北水利工程局。人事上只是徐正任局长，成润为副局长，高镜莹为总工程师，我为顾问。我们的工作性质和内容都和以前一样。

天津解放后，解放军给我的印象极好。我的宿舍东邻是化工研究所，所长张克忠是我的老同学。我在楼上打开窗户见到解放军与化工研究人员有说有笑，亲切如家人，心中充满钦佩之情，这是我第一次见到解放军。再一件事是，解放军第三十八军工兵营第三连连部驻在我的客厅，胡指导员以日内将举行追悼天津战役烈士大会，请我撰写了一副挽联，推辞不过，我写以下一副挽联：“反帝反封为革命而奋斗；成功成仁斯大义昭千古。”他很为感谢，相互交了朋友。几天以后，他们全连开拔，临行前又算交了水电煤费，我执意不收，他又向我讲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此种作风使我耳目一新，加深了对解放军的认识和感情。

（五）

解放后，我们工作重点是修官厅水库。在北京设立了官厅水库工程局负责其事。工程的作法和以前有些不同，由原计划的钢筋混凝土大坝改为土石大坝。整个工程由建国后成立的水利部直接领导，高镜莹局长专负工程技术方面的工作责任。进行中采用发动群众参加义务劳动的办法，只用两年左右时间就完成了，竟出乎意料地快和好。按我们原计划，在旧社会我们不少老水利常想，一生中能作好这一水库就于愿已足，不自此生，未敢想计划了多少年的官厅水库真能在我们手中建成。这

China

是新中国成立后建成的全国第一大水库。当建成剪彩参观时，很多老华北水利的人都非常激动，有的动情地流下眼泪。

修官厅水库的同时，完成了一条独流减河，是宣泄一部分大清河和南运河的水，由减河直接入海，以减轻洪水对天津的威胁。这也是解放前水利部门筹备了多年的工程，解放后很短时间完成了。工程采取以工代赈的方式，也是多方发动群众，故进行得很快。

应该说，天津解放后的市政工程建设，首要的就是水利工程。1949年夏季大雨，各河汛情很紧，黄敬市长常找我们几位水利人员到他家（现民革所在地）的楼顶开会，了解天津水情。市政府参加的有吴砚农秘书长、杨振亚副秘书长、市工程局张华戡局长等。黄敬市长拟请我主持市水利处，但华北人民政府主席董必武和华北水利工程局都不放，故一直拖到1952年才正式成立，我是天津市水利处第一任处长。

在水利处工作时，我正年富力强，工作也很顺心。看到市政府这样重视水利建设，看到黄敬市长、吴砚农秘书长等同志深入工作的情况，都加强了我对中国共产党的认识，受到了教育。以后市水利处改归市政工程局，工程、机构、人员等规模都有所扩大，工作也更紧张起来。这期间，我用主要力量在新开河畔原法商学院旁的师范学校内办了一个水利工程训练班，用一年多的时间，培养了近百人的水利工程人员，现在他们都已是天津水利工程工作中的骨干力量。

天津解放后的前四五年，防汛工作很紧张了一段时间，到1955和1956年时，上游来水已不甚多，又出现了新问题。因河水不多，故海水的两次回潮顶上来，没有汛水压下去，造成咸水顺流而上，饮用和灌溉都受影响。从中央起都酝酿要解决这

China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